

神秘文化在《三国演义》中的流贯及探源

郑铁生

【内容摘要】 神秘文化流贯于《三国演义》之中,其表现为谶纬、占卜和解梦等,其实质是卜筮文化。神秘文化的表现,展示了传统文化雅俗混杂、形而上与形而下包容的历史形成过程。神秘文化的价值为文学创作再现社会的文化结构和原始形态,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和表现手段。

【关键词】 神秘文化 谶纬 《三国演义》 俗文学 真实素材

谶纬、占卜和解梦等艺术描写在《三国演义》之中,自始至终流贯着。这些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文化,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糟粕,弃之如履。而当重新被人们审视的时候,不仅承认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俗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而且发现在浓厚的神秘主义迷雾中,隐藏着可以剥离的真理颗粒和不可忽视的价值。即使科学发展的今天,它仍旧渗透在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意识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探究它在《三国演义》中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功能,为的是更全面地理解这部伟大著作丰富而博大的社会意蕴,从文化学的视角扫视这块历史土壤上曾展现的时代氛围、社会情绪和世人心态。

谶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兴起于西汉哀、平之世,而盛行于东汉之际,红极一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三国演义》对谶纬泛滥的再现,正是那个时期的历史不可或缺的缩影。

谶语,自古以来就是预示人间吉凶祸福

的启示或隐语,多数都是采用歌谣谚语形式流传于世。早在先秦已有史可稽,多数都涉及到政治的兴衰治乱。到了西汉,用儒家的经义来解释谶语,纬中有谶,谶中有纬,二者合流,才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思潮。达到鼎盛时期是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上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

谶纬在东汉末年大量地出现,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工具。这与当时严重的政治危机,各派政治势力矛盾和斗争极端尖锐有密切的联系,甚至农民起义也借助于这种形式。《三国演义》一开篇写黄巾起义时“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篡权,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再如董卓进京,擅自废立,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上下的愤怒,九州各地的声讨。小说从四面八方写来,最后集中到一点:讨伐董卓,反对暴政。其中也没有放过对谶纬的描写。董卓在被杀之前,一次上朝,从郿坞望长安而来。行不到三十里,所乘之车,折轮断轡,已有灾难之兆。“是夜有十数小儿于郊外

作歌，风吹歌声入帐。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歌声悲切。卓问李肃曰：‘童谣主何吉凶？’肃曰：‘亦只是言刘氏灭、董氏兴之意。’”“次日侵晨，董卓……入朝，忽见一道人，青袍白巾，手执长竿，上缚布一丈，两头各书一‘口’字。卓问肃曰：‘此道人何意？’乃心恙之人也。”大祸临身，怪事迭起。“千里草”是“董”字、“十日卜”是“卓”字的拆字。长竿缚书，各书一“口”字，是“吕”字的象征，这些都预示着董卓将死在吕布之手。

《三国演义》真实地再现的谶纬，大都是有史可稽的。如预示董卓将亡，“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出自《后汉书·五行志（一）》。百姓反对孙皓迁都：“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出自《三国志·陆凯传》。孔明死后的木像吓跑了司马懿，谣曰：“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出自《三国志·诸葛亮传》。这些谶纬的背后都有复杂的历史现象，当它们点缀在小说情节中，便如高山流水，自然倾出；就像云容雾态，因风离合，浓重了神秘的氛围，渲染了历史的情绪。同时，又像一块块化石镶嵌在这部历史小说之中，凡理解的视野触及到它们的时候，便会诱发出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人民情绪崛起与衰落的思考。

谶纬是一种特殊的政治隐语，它避开了艰深的理论，用浅显易懂、易于成诵的谶语，向一般群众宣示舆论，富有煽动性的神秘色彩。其背后总有令人不可捉摸的冥冥上天，仿佛代天言事。借助“天命”、“神的启示”，来为政治家、阴谋家、野心家篡夺政权、改朝换代制造口实，发难于人。《三国演义》描写了曹丕篡汉的三部曲：一、假借天意；二、大闹逼宫；三、效古禅让。凡是问鼎者都必然把自己称王称帝说成是上承天意，如许芝对汉献帝大讲观天象，应图谶，说是夜观乾象，见炎刘气数已终，陛下帝星隐匿不明；魏国乾象，极天际地，言之难尽。更兼上应图谶，其谶曰：

“‘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以此论之，陛下可早禅位。‘鬼在边’，‘委相连’，是‘魏’字也；‘言在东，午在西’，乃‘许’字也；‘两日并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也。”早在25年前曹操与众谋士商议迎汉献帝迁都于许昌，荀彧曰：“汉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他日必兴者。”在《三国演义》的情节中，从不同的视角反复宣示汉朝属火德，至东汉末衰败。如徐庶唱歌词：“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孟公威作歌：“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桓灵季业火德衰，奸臣贼子调鼎鼐”；直到汉献帝禅让时也违心地降诏说：“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这一思想流贯在整部书中，并揭示中国封建时代天命观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是“五行”说。顾颉刚曾指出：“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

二

谶纬与占卜有着姻缘关系，它常以占卜的形式出现。《三国演义》第69回描写曹操的晚年思想偏于保守，他请东汉末年著名的占卜家管辂卜天下之事。“辂卜曰：‘三八纵横，黄猪遇虎；定军之南，伤折一股。’又令卜传祚修短之数。辂卜曰：‘狮子宫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孙极贵。’操问其详。辂曰：‘茫茫天数，不可预知。待后自验。’”管辂说的这两段谶语都是以占卜形式出现的先见之明。前一段谶语是两年后应验的。刘备与曹操汉中大战，黄忠智夺定军山，刀劈夏侯渊。“操闻渊死，放声大哭，方悟管辂所言：‘三八纵横’，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黄猪遇虎’，乃岁在己亥正月也；‘定军之南’，乃定军山之南也；‘伤折一股’，乃渊与操有兄弟之亲情也。”后一段谶语是三年后曹操死后才应验。曹操死于洛阳，按星相学划分洛阳一带称狮子宫，

在这里立了曹操的“神位”。曹操死后,曹丕立即篡夺了皇位,自命魏文帝,尊曹操为魏武帝,所以说“王道鼎新,子孙极贵”。可见以占卜形式出现的谶纬就更增加了神学色彩。

占卜比谶纬内容更庞杂,形式更繁多,诸如星命、相术、拆字、起课、风水等。流播也更广泛,并且有深厚的群众接受的心理基础。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占卜在殷周时代属于官方的一项严肃的制度,大多是遇到军国大事,有专门从事卜筮的官吏进行正规的庄重的占卜。到了春秋时代,占卜逐渐传至民间,以至普及到社会下层民众中,丧葬病老,纳妾生子,建坟筑房等生活领域里。到了汉代,占卜地位显著下降,不为朝廷所重,大多数占卜家流落到市井山野。《三国演义》在两个章回中刻画了管辂这位民间占卜家的形象,并一连讲了管辂占卜的系列故事,使我们从中领略了那个时代的民俗、思辩和哲理。管辂掌握“八卦幽微”、“六爻玄奥”进行占卜,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周易》是古人卜筮活动发展到了高度阶段而产生的,它的卦相中已蕴含了思辩,富有了哲理。尽管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但六十四卦的原始意象却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其中有形而上的东西,也有形而下的东西。毛氏本保留管辂占卜的几个故事都是属于形而下的东西。被毛宗岗删掉的一个细节,曹操与管辂论《周易·乾卦》则是形而上的内容。《周易·乾卦》云:“云从龙,风从虎。”曹操把“龙、虎”与“风、云”割裂来认识,他说:“龙动则景云起,虎啸则谷风至,所以为火星者龙,参星者虎。火出则云应,参出则风到,此乃阴阳之感化,非龙虎之所致也。”管辂指出曹操认识的偏颇:“夫论难当先审其本,然后求其理,理失则机谬,机谬则荣辱之主。”当曹操又说:“夫龙之在渊,不过一井之底;虎之悲啸,不过百步之中,形气浅弱,所通者近,何能兴云而驰东风?”管辂用精深的话语概括了“云从龙,风从虎”的辩证关系,他说:“王上岂不见阴阳燧在掌握

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阳之火,下引太阴之水,嘘吸之间,烟景以集。苟精气相感,悬象应乎二燧;苟不相感,则如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无有远近也。”管辂这段对话深刻的含义说明:英雄的内在素质和风云际会的外在机遇互相交感,彼此追求,云跟着龙而聚散,风跟着虎在动,这说明一切事物,各自循它类同的性质而相聚的道理。这些对话和论述都有别于占卜之术,是《周易》形而上的哲理。《周易》在其发展、流传的整个过程中,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东西都交汇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化雅俗相杂的一个显著特征。管辂被喻为“神人”,正是因为他运用《周易》,具有能卜善占、知机通玄的才能,小说根据《三国志》其本传勾勒他许多料事如神的故事。

占卜术的种类在《三国演义》里记述的主要有:

(一)天文占。利用日月星辰的运行、亮度和大小等进行占卜。“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而起,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矣!’”诸葛亮死时大星陨落的故事,也不是小说家的杜撰。《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阳秋》云:“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入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而小。俄而亮卒。”其根据则是星占学所讲的:“坠星之所,其下流血、破军、杀将,为咎最深。”周瑜、关羽、张飞之死都有类似的描写。

(二)风云占。以风云雷雾等现象为据进行占卜。《三国演义》“袁曹起兵”描写曹操进攻小沛,刘备与张飞定计,乘曹兵远来,必然困乏,遂于夜间劫寨。当曹操引兵来到小沛,“狂风骤至,忽听一声响亮,将一面牙旗吹折。操便令军兵且住,聚众谋士问吉凶。荀彧曰:‘风从何方来?吹折甚颜色旗?’操曰:‘风自东南方来,吹折角上牙旗,旗乃青红二色。’彧曰:‘不主别事,今夜刘备必来劫寨。’”曹操与荀彧这一占,破了刘备、张飞的计谋。再如诸

三

诸葛亮二次北伐，正“设宴大会诸将，计议出师。忽一阵大风，自东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树吹折。众皆大惊。孔明就占一课，曰：‘此风主损一大将！’诸将未信。”正饮酒忽报赵云病重而死，诸葛亮跌足大哭。风在古人心中被视为上天兆示人世吉凶的途径之一，因此形容某事的重大，常说“风云突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将风、云与人世吉凶祸福联系在一起。

(三)面相占。利用面相占卜在中国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心理适应，甚至将脸谱类型化，说奸则是“白脸曹操”，说忠则是“红脸关公”，说粗则是“黑脸张飞”……《三国演义》写刘备有帝王之相，“大耳垂肩，双手过膝”；孙权生来就有一副帝王相：方颐大口，碧眼紫髯。汉使刘琬曾入吴，见到孙家诸兄弟，于是对人说：“吾遍视孙氏兄弟，虽各才气透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仲谋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享高寿，众皆不及也。”果然孙策英年早逝，孙权16岁继兄位执掌江东大事。就与刘、曹相比，孙权活71岁。这比曹操活了66岁，刘备活了63岁，已算长寿，何况当时“人生七十古来稀”。识面相导致人一生的悲剧莫不过魏延了，《三国演义》第53回写魏延救了黄忠，献了长沙。关羽“引魏延来见，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刘备惊问何故？诸葛亮回答的理由：“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斩之，以绝祸根。”当时他虽被刘备救下，日后又为蜀汉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但诸葛亮临死布下杀其之计，仍未忘掉其“脑后有反骨”。

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观之，谶纬、占卜都体现了“天人感应”的观念，“上天”有主宰一切自然界变化和人世间祸福吉凶的无限权威和绝对意志，而且总是以征兆警示人们。《三国演义》整部书都贯穿这一思想，“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自然，谶纬、占卜都是代“天”言事了。

圆梦占卜活动在古人的生活中经常出现，《正字通》说：“占梦以决吉凶，曰圆梦。”《三国演义》在这方面的描写也是很多的。做梦是人皆有之的普遍现象，通过对梦象的占卜圆释，判明凶吉，显示福祸，普遍为古代人们所重视和接受。据战国末期《周礼》记载，那时已设立占梦官吏。《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梦之法，”“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我国殷虚发掘出的数万计的甲骨文碎片，又称“卜辞”，大都是卜筮之官的作品。可见占梦也是神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梦象的征兆基本上分为凶吉两大类。吉梦无非是福祿祥和，举凡财运亨通，科举中第，福寿延年，比比皆是。但《三国演义》中的吉梦却不流于凡俗，它紧紧和“君权神授”的思想相照应。大都以上天的物象，如日、月，和神圣的动物，如龙、凤，来与做梦人的身世、地位和前途相联系，显示出帝王之兆的祥瑞和贵不可言的崇拜。这是一个特点。如遭十长侍的劫持，少帝和陈留王流落在北邙山之畔，庄主崔毅“是夜梦两红日坠于庄后，惊觉，披衣出户，四下观望，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甘夫人夜梦仰吞北斗有孕”，乃生阿斗刘禅。吴国太生孙策、孙权时分别梦见日和月，皆是帝王之兆。这个素材出自《搜神记》：“孙坚夫人吴氏，孕而梦月入怀，已而生策。及权在孕，又梦日入怀。以告坚曰：‘妾昔怀策，梦月入怀；今又梦日，何也？’坚曰‘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龙是华夏的图腾，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成为帝王特有的象征。皇上是真龙天子，皇儿皇孙可以称为龙子龙孙。凤与龙一样也是虚构的神物，并且是吉祥的象征。只有德政清明，才能招至凤凰翔集。因此，曹丕手下群臣逼迫汉献帝禅让时，其中就编造了帝王祥和的景象：“自魏王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乐蔚生，甘露下降：此是

上天示瑞,魏当代汉之象也。”

《三国演义》中描写梦象更多的则是凶兆,这与群雄争权夺势,伺机问鼎的斗争相联系,为人物的命运和生活道路作铺垫。如马超梦见“身卧雪地,群虎来咬”,应和了其父马腾和其弟马休被曹操杀害;关羽“假寐于帐中。忽见一猪,其大如牛,浑身黑色,奔入帐中,径咬云长之足”。预示了关羽败走麦城,被害身亡;曹操“忽一夜梦三马同槽而食,”为司马氏篡魏打下伏笔。其中邓艾做梦,小说做了详细的描述:

邓艾夜作一梦:梦见登高山,望汉中,忽于脚下迸出一泉,水势上涌。须臾惊觉,浑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护卫爱邵问之。邵素明《周易》,艾备言其梦,邵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云:‘《蹇卦》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将军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滞不能还。”艾闻言,愀然不乐。

这段描述出自《三国志·魏书·邓艾传》,一、有正史可稽;二、占卜不虚饰,有好则说好,有坏则说坏;三、与人物命运和结局的走向大致相吻合。这不是小说家的艺术虚构。从中可以透视当占卜与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以及人物的独特心理分析相一致,能够有一定的预测性,这就为占卜的准确性找到了合理的成分。尽管占卜大多是虚妄之说。但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带有合理的因素,而能使预测灵验。不然,为什么占梦能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具有如此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占梦者有的是民间的,也有的是官方的,《三国演义》中记叙了一位民间占卜家管辂,一位占卜官赵直,还有一些不以占卜为专职,但也能掐会算的文人谋士。他们的运作丰富和发展了占梦的理论及风俗。以至在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艺术、文学以及民俗文化等方面无不烙着它的斑斑印痕。仅占梦术就有易卦法、五行法、测字法、物象法、反说法等,上面邓艾一例便是采

用易卦法。

测字法也是占梦中运用最广泛最常见的一种;而且富有民族特色。汉字是中国独具的形、音、义方块字,不管从形、音、义哪一方面,都能派生出诸多的方法。将字象与梦象相联系,再从字象中演绎出的特征,推断吉凶。例如:魏延夜梦头上长角,并请司马赵直卜算,“赵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头上有角,苍龙头上有角,乃变化飞腾之象也。’延大喜曰:‘如应公言,当有重谢!’”赵直正遇尚书费祎,问起此事;并告之“此本非吉兆”。费祎又问:“足下何以知非吉兆?”直曰:“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今头上用刀,其凶甚矣。”果然魏延与杨仪争权,被杀,赵直的话得到应验。这件事在《三国志·魏延传》中也有记载:“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赵直诈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不同的是小说在采用这一素材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做了移动。

再如物象法。何晏请管辂为之卜卦:“可至三公否?”又问:“连梦青蝇数十,来集鼻上,此是何兆?”管辂曰:“元、恺辅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且鼻者,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臭恶而集焉。位峻者颠,可不惧乎?愿君侯哀(póu)多益寡,非礼勿履;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这个例证记载在《三国志》管辂本传中。

四

上面列举的例证,都是既有正史记载,又得到验证,不能简单地视为虚妄之说,这就再一次说明在神秘色彩包裹着的东西,并不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有合理的可信的成分。应当通过透视神秘文化,看其特征和价值。

(一) 神秘文化的实质是卜筮文化,它的特征是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实用操作奇妙地组合在一起。

尽管我们是从《三国演义》谶纬、占卜和圆梦这一神秘文化的视觉探究,但当整体把握之后,仍旧会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你从一个视角扫视这部名著,都会感到它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思辨意味,流贯着一种哲学意识,那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念像一个巨大的神经之网,无处不渗透。无论分析人物性格、诗词内涵、情节结构哪一方面,都会触到这张神经之网。犹如中医讲人体的经络一样。连接着许多穴位,而且流贯着摸不着、看不见的内气。它的的确确地存在,并制约着人体的各个器官和部位,但西医解剖人体时,却常常找不到穴位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有些原著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形式之后,人们会感到形虽似但神不足,意虽真但味不浓,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总把“天人感应”这样的哲学观划入神学的范围,弃之不顾,把那神秘之雾笼罩下的必然存在的合理的东西,用现代的思维观念去清理得干干净净。留下的只能象西医解剖人体一样,虽然实实在在,器官俱全,然而那制约和贯通整体系统的穴位、经络一样的东西却荡然不存,因而,失掉了鲜活、灵动的气质和精神的原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整体思维,《周易》是这一思维的浓缩形式。它既蕴含着“一阴一阳谓之道”朴素辩证法和“五行”物质第一性的朴素唯物观,又包容在卜筮巫术的外壳下,用形而上学象数去窥探神的意旨的低级的思维模式之中,而且形成一种哲学思维与卜筮巫术奇妙的组合。可以说,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无处不涉及到《周易》;扫视《三国演义》时,也时时处处遇到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阴阳”、“五行”、“易卦”这些并不全是思辨范畴,而是具有了实用性的操作功能,具体地就表现为谶纬、占

卜、圆梦这些形形色色的卜筮活动。只有看清这一特征,才能明白巫术、哲学、科学、史学各个层面,及方法论、认识论诸多因素何以杂揉地组合在一起。只有按照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待这一切,才能分清这些复杂性质的东西是如何整合在的,不能采取像解剖术一样的分割。

(二) 神秘文化的表现,展示了传统文化雅俗混杂、形而上与形而下包容的历史形成过程。

《三国演义》是明代俗文学的代表作,当它今天成为中国古代经典之作,并没有丧失原本俗文学的素质,相反保留的那些俗文学素质在今天尤其显得珍贵,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和风俗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文化史,是各种文化因素的复合体。其内容庞杂,颇多矛盾,不仅有灾异感应,谶语民谣,占卜巫术,神妖鬼怪,而且还有天文地理,风土民俗,哲学思辨,文字训诂;不仅有神学宗教、唯心迷信,原始思维,而且有唯物哲学、辩证思维,文化创造;不仅有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农民起义借助神学的武器,喊出革命的口号,而且有野心勃勃,兴师问鼎的政治阴谋;不仅有维护社会统一,发展国力的进步知识分子的运筹谋画,而且有分疆裂土,发动战争的奸雄乱党的推波助澜……尽管从表面看上去,是那樣的肤浅粗糙、朦胧无序,零散琐碎,但正是这些因素,无处不见,无处不有,形成一定的氛围,一定的情绪,而表现了特定时代的世俗人情,社会情绪和历史倾向,构成了三国时代动态、分化和组合的社会变革的胎痕,曲曲折折的历史前进的先声。总之,是那个时代真实而生动的再现。这一切对于文化学、民俗学、文艺学都是珍贵的,只有恰当做出理论上的价值判断和历史评说,才分清它们的主次本末,正传别传。也正因如此,才显示出真正浓郁的民族特点。表现这些,犹如保留黄河水中的砂石和泥土,一旦净化,失掉了黄河水的泥味、土

色,就不成为其为黄河水。古代小说保留的形象的活的文化形态,比之历史典籍更能表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

(三)神秘文化的价值为文学创作再现社会的文化结构和原始形态提供了真实的素材和表现手段。

《三国演义》中大量谶纬、占卜、释梦的描写,其中部分即使属于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对于文学创作提供的原始素材和表现手段来讲,也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在它的背后隐藏的是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时代各种社会层次的不同心态再现,是形形色色的期待、欲望、阴谋心理的展露,是写实主义文学对人的精神世界与心理活动,特别是刻画人物的深层心理,深化人物性格极好的艺术表现手段。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题材的本身并不是衡量文学作品优劣好坏的唯一尺度。这本来是文学理论中很明白的道理,可在文学实践中却总是违背它。例如《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用现代人的思维去清理小说中神秘文化的描写。从表面上看似乎破除了迷信,实则是浅薄的对待历史。不仅失掉了原著特有的意味,而且有意无意地造成人物性格的不统一,比如让诸葛亮自觉地假借天象,劝说刘备进攻雒城不要操之过急。庞统未听,而葬身落凤坡。这种

改动,既拔高了人物特定时代既有的思想水平,又与诸葛亮儒道互补的思想性格不相协调。我认为问题不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一些人长期受极左思想的禁锢,思维模式已僵化。在时代进步的今天,本来不该出现的问题,也要付出艰难的努力,去摆正。如同在孩童时就常听老一辈讲述“狼来的故事”,教导人们从小说真话,可我们的国家和党经历了几十年深重的历史教训,才拨乱反正,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为说真话付出了多么昂贵与惨痛的代价。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践中遵循最基本最普通的道理,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总之,神秘文化在《三国演义》中的流贯及探源,是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复杂而艰深的课题,涉及到巫术、哲学、政治、科学、史学、伦理学、文字学诸多层面的性质,而且的确对中国古代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以至在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中还抹不走留下的基因。正视它,科学地解释它,是弘扬国学必不可少的理论批判。

(作者职称、单位:教授;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天津 300204)